

鲍勃·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之流变

马双¹ 陈历明²

(1. 闽南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332; 2. 华侨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鲍勃·迪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蜚声欧美,但直到 80 年代初,中国才有零星译介;改革开放以来,迪伦在中国的译介趋向相对多元;迪伦于 2016 年以诗人歌手的身份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后,迪伦译介进入了相对繁盛期。检视这半个世纪以来迪伦在中国的旅行可知,社会变迁与抒情传统的底蕴驱动构成了外国文艺的中国译介。梳理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可以管窥特定时期的文艺政策如何影响外国文艺在中国的接受与流变,借此阐明其翻译与接受之嬗变的社会文化成因。

关键词:鲍勃·迪伦;歌曲;译介与接受;文艺政策;审美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132-11

近年来,东西方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尤其文学与音乐文学的阐释及其译介,包括“视听翻译”。它介于雅各布森(Jakobson, 1971: 261)界定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之后两种。美国音乐文化偶像、歌曲作家鲍勃·迪伦 2016 年“意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激发了学界呼吁音乐文学的传统回归。梳理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可以管窥特定时期外国文艺在中国的接受与流变。毕竟,历史总是思想的体现,翻译史亦然,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于人的意志而发生的”(Collingwood, 1946: 155-156)。社会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思想因素在历史发展中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鲍勃·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印证了这一点。以此概览鲍勃·迪伦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的译介与流变,可望达到一种史论互证,亦可为艺术史及文学翻译史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参照。

1 70 年代:鲍勃·迪伦在中国译介的肇始

作为美国 60 年代的民谣灵魂人物,鲍勃·迪伦在中国的译介晚于国外近 20 年,这与西方其他艺术家和作家在特定时期的中国的情况基本一致。20 世纪 40 年代的文艺政策,影响了西方作家和文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政治对文艺的指导是毋庸置疑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毛泽东, 1991: 865-869)因此,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只有狄更斯、马克·吐温、欧·亨利等少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少量作品得以译介出版。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系列音乐刊物如《广播歌选》《歌曲》等开始公开发行,但能被译介出版发行的作品基本限于以苏联为主的

收稿日期:2022-07-15

作者简介:马双,女,闽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学、音乐文学翻译研究。

陈历明,男,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文学翻译(批评)、音乐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

引用格式:马双,陈历明. 鲍勃·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之流变[J]. 外国语文, 2023(1): 132-142.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偶有朝鲜及东欧国家的歌曲(薛范,2001:16),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不乏艺术性的苏联革命歌曲。总体而言,6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对西方文艺作品的译介不仅数量少,而且整体质量一般,在美国五六十年代就已轰动乐坛的迪伦等世界知名音乐人在中国的译介难觅其踪。

稽考中国流行音乐史以及音乐期刊书籍史料,就现有资料所及,我国对迪伦的译介最早见于1978年的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译本《光荣与梦想》。本书卷帙浩繁,对迪伦的提及并不多。其中一处提到,本土成名后的迪伦于1969年到达英伦,15万“服饰古怪的非男非女的青年”组织怀特岛音乐节,邀请迪伦前往(曼彻斯特,1978:1642)。迪伦并非该书的重点,其介绍亦不过蜻蜓点水,但其“反主流文化”的形象随此书被译介至中国,尽管影响甚微,却是迪伦在中国译介之肇始。

2 八九十年代的开端

1975年,邓小平在《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1994:35)四年后,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994:210)。此后,文艺赖以生存的环境逐渐变宽松和开放,艺术的发展逐渐走向多元化。此前被贴上“封资修”标签的英美文学作品由此得以大量引进与译介,外国歌曲的译介也开始复苏,部分海外流行歌曲得到译介并刊行。各地音乐期刊纷纷译载西方歌曲:停刊12年的《歌曲》开始复刊,上海文艺(音乐)出版社率先推出一些外国歌曲集,其中,《中外通俗歌曲300首》等影响较大(薛范,2001:19)。此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胡炳堃等人译的《美国歌曲选》(1980),章珍芳所著的《美国歌曲选》(1982),薛范等人译配的《新译外国名歌120首》(1985)等介绍西方流行歌曲的作品都相继出版,外国歌曲的译介达到一个相对繁荣期。

鲍勃·迪伦在1982年进入中国的依据主要因为其作品“具有进步意义”,为“美国当代著名的民歌演唱者和词曲作者”,“创作了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歌曲”(章珍芳,1982:248-249)。80年代的音乐出版中,对于鲍勃·迪伦的认识大多是因为其“歌曲倾向于进步,主题多为人的权利、反对核恐怖以及资本世界中人的孤独和痛苦”(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310),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尤见于其代表作《随风而逝》(*Blowin' in the Wind*):“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美国极为流行,一度成为民权运动的赞歌之一,作者鲍勃·迪伦也是美国民歌复兴运动的著名歌手和推进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组,1986:48)而在《现代世界文化词典》中,迪伦被视为“摇滚乐唯一主要的艺术家”,他的歌曲表现了“在处理反黑人罪行中所谓‘不偏不倚的正义’的可耻,表现了滋生这种罪行的那个阶级社会所采用的引起分裂的策略,也间或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被无情遗弃的穷苦白人的绝望”(温特尔,1988:172)。迪伦能够在80年代作为民谣摇滚的代表被译入中国,正是因为其代表作品中体现的反战、反文化的进步意识。

80年代末至90年代,市面上开始涌现出如《世界摇滚乐大观》(1992)《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1998)等部分译介西方摇滚音乐的书籍,这在当时可谓重要的文化事件,都与迪伦有着某些关联。《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以时间顺序简要介绍了迪伦作为抗议歌手时期的歌曲以及后期的创作,肯定了迪伦“出色的歌手和歌曲作家”的身份,认为他的歌词创作“比较深刻,富有文学性和哲理性,经

常使用隐喻、象征等手法,虽然有时也有点晦涩难懂。总之,他对摇滚乐作出了重要贡献,把摇滚乐的歌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钟子林,1998:89)。《世界摇滚乐大观》应为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摇滚乐的作品,作者概述了迪伦从出道到成为现代民谣王子的过程,认为“迪伦的半出世思想,对人文的观(关)注、反映社会阶层的写实风格及青年文化运动的理念,无一不对美国60年代末缤纷灿烂的大时代产生影响,并成为不可多得的力量源泉”;其《金发叠金发》充满浓郁的摇滚风味,“实现了诗人迪伦理想中的音乐融合”。这些足以使他和英国的披头士“并列为对全球青年最具影响力的摇滚音乐家”(黄燎原等,1992:22-27),尽管书中鲜有提及迪伦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却敏锐地观察到了迪伦在西方文化界的影响力:“直到60年代终,迪伦的存在一直强烈而又全面地影响着西方的通俗文化,迪伦个人也神话般地成为人人敬慕的对象,这些敬慕者层次结构已经超越了乐迷的领域,因为这时在文学、社会学、哲学等学术界中,出现一派名为迪伦主义的迪伦研究学者。”(黄燎原等,1992:49)作者通过描述迪伦的歌曲创作和他对西方音乐世界的影响力,为读者和音乐爱好者了解迪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视角,在摇滚乐尚被视为禁忌的90年代初,该书成为众人了解摇滚乐的启蒙读物,而着墨较多的迪伦也获得更多的关注,学界由此渐渐开始从文学和诗歌角度挖掘迪伦及其作品的价值。也许正是由于迪伦在近乎所有西方流行音乐介绍的书籍中占据民谣摇滚领军人物的重要地位,而《随风而逝》中体现反战、反文化的进步价值观念,较之其他的西方摇滚歌手,迪伦在中国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度,该歌曲也以不同词曲谱版本被大多数国人所熟知,甚至一度成为中学生作文题目。

国内最早关于迪伦的学术研究,应为谭冰若于1986年发表在《音乐爱好者》的论文。作者分析了迪伦受欢迎的原因,认为他“充满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其抗议歌曲“对种族歧视、资本主义腐败的体制以及侵略战争等,都作了尖锐无情的指责”,不乏“对旧制度的抗议,对社会与人生的严肃的思索和对事物不断的革新与创造”(谭冰若,1986:40-45)。该文关注其反现实、反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层面,而不太关注其文学性与艺术性。十年后,滕继萌先后在《外国文艺》发表有关迪伦生平与创作的两篇文章,一篇概述了迪伦的生平,从学理上介绍并阐述其诗歌创作、诗乐交融的特点与影响,对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迪伦“作为战后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代言人,创作了大量极具史诗性的流行音乐诗篇”,肯定其“不仅是位表演艺术家,而且还是位颇有建树的诗人”(1996:1-2)。滕继萌从音乐风格以及创作手法等方面评述迪伦的师承与创作特点,认为他“承袭并重新再现了‘垮掉派’作家在50年代中期竭力推崇的文学试验,实现了诗歌同音乐的融合”,“借助现代大众媒体艺术的民谣重新使诗歌平民化,同时,又不使其丧失固有的高品位的文学特征”(1996:39-40)。

此间有关迪伦的译著也不多见,比较重要是方晓光翻译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1985)。原作者从政治、哲学、文学、新闻、音乐等方面描述和分析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及摇滚乐带给时代的力量,对60年代活跃在摇滚乐舞台上的民谣摇滚领袖迪伦及其作品做了深刻的剖析,描述了迪伦在当时的影响力。作者借迪伦由民谣向摇滚的转变历程,认为其作品中“日益增长的暴力和强度反映了国内的日益扩大的暴力,从民歌向摇滚乐的转变也反映了在价值观念上从‘真诚’向‘真实性’的转变”,并且视迪伦和乐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在最大程度上象征和再现了整个文化阶段”(迪克斯坦,1985:186)。本书阐述了迪伦的转变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之关系,兼具广度和深度,因而在中国产生一定影响,被誉为“获悉鲍勃·迪伦的人格精神和思想脉络的全部来源”(李皖,2014:11)。

80年代有译者将迪伦的少数几首歌词以诗歌形式单独译出。1988年《国际诗坛》杂志第一辑(总共四辑)收录了白婴所译《让我死在自己的脚步声里》《答案飘在风里》《一场凶暴的雨快要来了》等六首歌曲,全部译自1987年英国出版的*Lyrics, 1962—1985 by Bob Dylan*。白婴如是介绍:迪伦60年代创作的抗议歌曲“记录了美国青年在苦难的年代里失望、悲痛和愤怒,这些歌词部分被编入《美国诗歌一百首》,可惜他作为民歌手的名气太大,把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掩盖了”(1988:164)。他强调迪伦的批判性,也点到了迪伦独具的文学创作才华。此后,周泽若以诗歌形式翻译了迪伦四首代表作:《大雨将至》《鼓手坦布尔曼先生》《自由的呐喊》《荒凉街区》,刊于《外国文学》(1996)。不过,这些都是适于阅读而非歌唱的,换言之,翻译的是文字,不是歌曲。

迪伦迟至90年代才真正引起少数学者和音乐人的关注。作为大众文化的流行音乐,特别是“豪放不羁”的摇滚乐,不受主流文化重视。有摇滚乐身份的迪伦及其音乐在中国的“旅行”仍然举步维艰,人们只能从少数被译介过来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歌曲中对他有粗略的认识,很难从音乐和文学的深层次去领悟其作品的艺术匠心及其背后的文化。加之当时大多数译者缺乏音乐素养,歌曲翻译事业落后,导致“译配工作者后继无人”(薛范,2001:20)。60年代,迪伦转向民谣摇滚,对当时国民来说,这是一种极为陌生的新的音乐形式,他们尚未准备好接纳这一“异端”。异质文化在本土的旅行并不是畅行无阻的,势必要穿过“形形色色语境的压力”(Said, 1983:227),更要突破固有的思维,这无疑都是需要时间的。更何况,西方摇滚乐向以逆主流、反文化的歌曲内涵以及煽动性的表演为特征,因其“歌词中有消极的成分,不是积极向上、健康的东西”,被认定为“不利于安定团结”而遭到抑制(陆凌涛等,2003:366)。直到1986年崔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演出一首《一无所有》,因其公益性获得某种合法性,中国摇滚乐才由此开始从地下转到地上,燃起国人对摇滚的热情,逐渐为部分受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接受。

这一迟到的开端为鲍勃·迪伦在中国的译介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0世纪的激情:摇滚乐》(程工,1999)和《摇滚与文化》(王逢振,1999)等专著公开介绍迪伦等西方摇滚乐明星、作品、流派及其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也见证了摇滚乐在中国译介的开始,相关出版与日俱增,对西方摇滚流派和以迪伦为代表的音乐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介绍,肯定迪伦作为民谣摇滚代表人物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中国音乐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2000年之后:相对繁盛期

进入21世纪,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及其大众(音乐)文化市场的需要增加,西方流行音乐在中国拥有越来越高的接受度,影响并激发了本土的创作和表演,这也直接促成了迪伦作为民谣摇滚的奠基者频现于多种媒体的英文经典歌曲中。对于迪伦的介绍,不再止于其“进步意义”的描述,更多关注其人、其音乐主题、内涵和音乐风格的借鉴、发掘与探讨,认可其为美国“年轻人反抗现存制度弊端的代言人”身份(曹新宇等,2002:43),认识到“他的歌曲许多都涉及尖锐的社会问题,也被称为‘抗议歌手’”(庄耀,2000:272),肯定“他的歌曲有申诉,有抗争,有被压迫者所作的不平之鸣,而且题材多样,立意新颖、构思精巧,被誉为‘新一代文化的代表’”(李

凌等,2005:398-399)。此外,学术期刊与主流报纸上陆续出现运用文学研究方法论述迪伦及其歌曲的文章。中国知网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关于迪伦的论文收录仅五篇;新世纪伊始至2015年期间,中国知网收录了14篇。少数学术论文特别谈到迪伦的摇滚艺术价值以及对年轻人的影响(陆修远,2010;杨丛梅,2010)。

受惠于现代网络传媒的发展,有关鲍勃·迪伦的报道更加多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迪伦来华开演唱会,《光明日报》以《鲍勃·迪伦来了》这样一种广告式的宣示性标题予以报道,虽然篇幅不大,但充分肯定了迪伦作为“摇滚歌手”和“摇滚诗人”的身份,认可其既“带来了一种心灵的艺术”,同时“带来了一个艺术家所应遵循的法则”(周立文,2011:2)。《三联生活周刊》更是对此予以专题报道,数位资深摇滚音乐迷对迪伦的成功之路及其音乐创作与时代背景做了详细的介绍。主笔王小峰拾取各种采访片段来印证迪伦的神秘与未知,“他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王小峰,2011:41)。袁越在《鲍勃·迪伦的时代》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迪伦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高涨的时代潮流中,如何被时代影响,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时代,描写了左派运动、垮掉派运动以及嬉皮士运动下的美国和迪伦的相互关系,以及歌手开创的一个文化时代。诗人欧阳江河提醒读者:“迪伦是一个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但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诗人”,因为迪伦民谣诗歌的“范围远比艾略特那样的精英诗人要广阔”。他将迪伦置于20世纪下半期的诗歌演化史中,重读并辨析迪伦的抗议民谣,认为“迪伦的歌词里,有大的历史叙事,有范畴和镜像,有灵魂的重影和回声”(2011:69-70),他不仅毫无保留地给予诗人同气相酬的认同与尊重,而且洞见地指出诗与歌不同的审美路径与诗歌合一后的魅力所在。对于诗人而言,其文学价值与音乐价值无法相互取代。《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艺类杂志,其多次的专题报道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为立体而全面的迪伦。

此外,大量的西方流行音乐书籍相继出版,尽管良莠不齐,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迪伦、杰克逊等西方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家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涉及迪伦歌曲译配的书籍主要有《英文经典歌曲精选:中英文对照》(2000)、《英文流行歌曲经典100首》(2001)、《西方流行音乐简史》(2002)、《经典英文歌曲》(2003)、《民间歌曲·现代创作歌曲》(2005)、《中外音乐简史及名作赏析》(2006)、《流行音乐之旅》(2012)等。其中在《流行音乐之旅》中,首次出现译配的五线谱形式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作者尝试从音乐鉴赏的角度分析,认为该歌曲与歌者沙哑而沧桑的嗓音相映成趣,其“旋律的节奏与语言的节奏高度吻合,将语音与音乐高度融合,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思想”(杜梦甦,2012:30)。作者不仅分析了歌曲的音乐与表演风格,还谈到接受者的心理反应。

流行音乐书籍如《探索与狂热:现代西方音乐艺术》(2000)、《欧美流行音乐指南》(2008)、《摇滚时代》(2010)、《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2010)等均收有迪伦的介绍,视其为“摇滚乐时代最有影响的歌手和歌曲创作者”,认为“他的音乐对理解和分析6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王小峰,2008:385-391)。值得一提的是,已有部分作者注意到迪伦歌词的文学价值,认为“迪伦创造性地将朴素清新的民谣与艰涩难解的现代诗熔于一炉”,“加之他确实又从‘垮掉派’诗人的主将那里汲取了不少营养,这些营养有效地丰富和滋润了他的作品,使他的作品中常充满了荒诞又不乏哲理的意象”(沉睡,2010:206-210)。这些研究对迪伦创作来源、作品意境和蕴涵及其成功的文化背景做了比较专业的阐述和审美鉴赏,对迪伦的专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已有明显的提高。

由于鲍勃·迪伦在民谣摇滚的历史地位,国内专门撰写以迪伦为主要人物的音乐类书籍已不乏其例。袁越所著的《来自民间的叛逆》(2008)以迪伦为主线,穿插介绍美国民歌的历史、歌手及其歌曲译介,是了解迪伦音乐与人生的佳作。张铁志所著的《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 U2 的抵抗之声》(2010)以及《声音与愤怒》(2011)则从政治、文化与音乐三个方面分析了迪伦的音乐创作,认为“当其他人把歌曲当作抗议的武器时,迪伦只是把抗议当作歌曲的素材之一,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荒芜与体制的荒谬”(张铁志,2010:89)。乐评人马世芳以迪伦歌曲“My Back Pages”为题出版的《昨日书》(2011)描述了作者自身的音乐往事,其中穿插介绍了迪伦、列侬等摇滚明星。乐评人李皖也在其所著的《娱死记》中以《我的鲍勃·迪伦》开篇,从西方摇滚和民谣谈到中国的摇滚和民谣,并视迪伦为“青年精神的象征”(2014:10)。这些著作均试图全面梳理西方摇滚乐的发展脉络,不复以往对迪伦乃至西方流行音乐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过于单一而粗浅的介绍,开始以多元视角解读作品,并以此反思我国当下流行音乐文化。这无疑激发了音乐界对美国摇滚乐以及代表人物迪伦更加浓厚的兴趣,由此催发了围绕摇滚乐和迪伦的外语中文翻译类作品的出版。这类译本主要有《剑桥插图音乐指南》(2002)、《摇滚:一部社会史》(2013)、《认识摇滚乐:第7版》(2015)以及自传类作品《沿着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2012)、《他是谁?探究真实的鲍勃·迪伦》(2015)以及迪伦的《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2006)等。西方摇滚乐书籍的译介以及迪伦作品的译介侧面反映出他在中国的接受逐渐多元,对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接受并借鉴迪伦及其所代表的音乐文化,以及本土(摇滚)音乐文化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4 诺贝尔文学奖:转折点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真正开启有关迪伦的学术研究与迪伦音乐文学的系统翻译。迪伦因“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开创了崭新的诗意表达”而荣膺这一重奖,这更加夯实了迪伦音乐文学的经典化基础并扩展了其世界影响力。迪伦作为摇滚歌手和歌曲作家斩获此奖,颇有突破诺奖传统的意味,因而不乏全球性的轰动效应。中国各大主流媒体竞相报道了这一“震惊”消息。无论褒贬,诺贝尔文学奖的效应不仅再一次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并强化了迪伦的世界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文学界和文艺界对迪伦的研究。其诗人的身份及其歌词的音乐性与文学性成为研究热点,可谓好评如潮也争议如潮。但无论如何,这两种艺术的融合之魅与美都是大众难以抗拒的,迪伦的获奖也是对古往今来诗歌、音乐与演唱三位一体的传统的呼唤,正如评委恩达尔所示:“他的歌曲具备极致之美”,“借用商业化的留声机唱片这种最不可能的媒介,迪伦还诗歌语言以崇高的风格,这是自浪漫主义时代之后便已丧失了的风格”。这是对当代所遗忘的传统的回归,毕竟,自远古以来,“诸神并不写作,他们跳舞,他们歌唱”(恩达尔,2016:7-9)。新闻报道随之跟进,几乎所有的纸媒和(电子)自媒体都有迪伦获奖的报道或业界人士的反响采访。其中,2016年《光明日报》用了个整版的篇幅(包括两篇评述和两首译诗)予以报道。丁杨(2016)认为迪伦“用音乐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平等和美好呐喊”。曹华飞(2016)肯定迪伦“不仅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歌坛,而且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力蔓延至包括文学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他的获奖是“对文学的自我开拓”。这些报道肯定了迪伦作为作家与音乐家的艺术地位与影响。

学术研究方面,自2016年10月中旬至2021年12月间,有关迪伦的报刊文章仅中国知网收录

的就多达 244 篇。《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词刊》等重要期刊都设有专题探讨,部分收录与鲍勃·迪伦有关的汉译文章,如《世界文学》曾收录来自《鲍勃·迪伦剑桥手册》中的《作为词作家的鲍勃·迪伦》和《鲍勃·迪伦与学苑》两篇学术译作。在前文中,作者论及迪伦与莎士比亚之间的关联时,引用叶芝对莎士比亚作品特质的评论,认为迪伦歌曲创作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消极感受力”,亦即“一个人能安心处于不确定、神秘或怀疑的状态中,而不会急躁地去寻找事实,弄清理据”的特质(迪科蒂斯,2017:44)。在后文中,作者指出,在已出版的学术类著作中,大多数作者都将迪伦视为诗人,运用文学研究的方法来考究他的作品,却过度重视迪伦的歌词,忽视了“演奏乃歌词之媒介”的事实(马歇尔,2017:69),毕竟,“歌的情感力量与艺术感染力其实不但源自歌词的语义内容,也源自声音的组合。迪伦的歌词是写来演奏的:音乐、声音、歌词三者合一,才造就出一个杰出的文化艺术品而不是一首纯粹用言语表达的诗歌。分析若要深中肯綮,必须将音乐和声音的表演考虑进去”(马歇尔,2017:66-67)。作者因此建议“当务之急在于,通俗音乐的研究必须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处理通俗音乐文本——不但要看它的社会语境(这自然很重要),还要看它如何通过音乐、演奏和声音——而不仅仅是文字——创造出美的效果”(马歇尔,2017:77)。

《外国文艺》专题收录的大部分都是非学术化的探讨和国外文章的译作,比如李皖(2017)通过分析迪伦几首重要作品,探讨迪伦的歌词与诗歌的重叠与分野,考察迪伦的文学意义。专题的其他译作如《鲍勃·迪伦:不断突破》《鲍勃·迪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等都是译自外媒报刊文章,主题不外乎围绕迪伦的采访内容讨论他的音乐以及论述是否应该将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此举的意义和影响等。这些更关注大众在接受性。《中国文学研究》随之跟进,从文学的角度专题审视迪伦的获奖,分别发表了赖大仁、马汉广以及赵炎秋三位学者的笔谈,重审和反思文学事件、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功能,文学观念发生的转型,以及讨论诺奖评委的文学观等(赖大仁,2018;马汉广,2018;赵炎秋,2018)。马汉广从事件的角度聚焦迪伦的获奖,认为此举“表现着某种外界的思想和经验,对文学划界的对象、内容的确定和研究方式产生深远影响”(2017:158)。

这期间,先后有学者有意识地从文学与文化理论的视角研究迪伦的作品。杨晶(2018)认为鲍勃·迪伦作为民谣摇滚歌手,“是‘文学文化’建构所取得的实绩”。卢贝贝(2017)在梳理迪伦在中国译介历史的基础上,论述了其在我国音乐界和诗坛上的不同形象,并从形象学的角度考察了其中的缘由。林佩璇(2018)从话语修辞视角探讨了迪伦作品中的多维互文性融合手法。王刚(2019)则认为迪伦的自传《编年史》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文学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唐进和赵成明(2020)聚焦迪伦作品的诗化问题,探讨其人物特征、音乐特性。郑春生(2020)认为迪伦形象的自塑与他塑殊途同归。姚本标和才卓男(2020)以新历史主义解读迪伦的诗歌《暴雨将至》。王迪与傅琼(2020)尝试以原型理论解读迪伦的诗歌。徐思园与田俊武(2020)用文学伦理学探讨迪伦歌曲中的爱情伦理。这些更加学术化的探讨无疑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上推进迪伦的研究。

概言之,2016 年迪伦的获奖可谓一个分水岭,对于迪伦的研究很明显已跳脱出之前视其为歌手的身份以及摇滚艺术家的范畴,更多转向其诗人身份及其如何融诗与歌为一体的文学性研究及其大众文化象征的探索。

作品翻译方面,由于西方国家自 60 年代就已开展关于迪伦的学术研究,出现了“迪伦学”(Dylanology)的热潮,更有多部论述翔实的迪伦传记面世。但其传记的翻译热潮乘着迪伦获奖之东

风突然来临,仅2017年就有《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曾几何时:鲍勃·迪伦传》与《鲍勃·迪伦诗人之歌》三部译著,有助于读者多方位了解这位诗人歌手。2018年和2019年分别又有了译作《鲍勃·迪伦与地下老美国》《鲍勃·迪伦与美国时代》和《剑桥鲍勃·迪伦手册》的问世,2020年新译作《鲍勃·迪伦:重访61号公路》以及译作迪伦的《狼蛛》也得以翻译出版。其中,《剑桥鲍勃·迪伦手册》是学术研究读本,由各个领域的迪伦专家分别对迪伦作品中的反讽、政治修辞、现代主义的文本性、互文性等文学价值做了深入的分析,这表明迪伦在中国的译介已从简单的歌曲介绍、歌手身份的认同过渡到真正学术化研究。

除了自传类译著的繁盛之外,迪伦歌词的译介也越来越丰富。2016年10月迪伦获奖后,诗人周公度旋于11月在《诗歌月刊》发表迪伦译诗20首,认为“其词曲创作受‘垮掉派’作家和现代诗人的影响,变得更富于诗性,展示出更多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深刻思考,大大提升了摇滚乐的精神品格”(2016:33)。同月他还在《青春》月刊发表译诗3首(2016)。这都是迪伦获奖提升音乐文学的经典化引发的快速反应,其简短的评价也到位。学术期刊《世界文学》也快速跟进,于2017年第2期出版了迪伦的专题研究,刊发了傅浩与戴潍娜两位译者分别翻译的13首迪伦的歌词。译者清楚地意识到“译歌词之难,难于译诗,不啻一种挑战,因为不仅须翻译意义,而且应模拟节奏,配合乐曲,照谱填词”,“边听原唱边斟酌译文”(傅浩,2017:12-13),因此其译词大致可与音乐相配。

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2017年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鲍勃·迪伦诗歌集》系列丛书,共八个袖珍本(分别为《暴雨将至》《地下乡愁蓝调》《像一块滚石》《敲着天堂的大门》《慢车开来》《帝国滑稽剧》《红色天空下》《爱与偷》),集中收录迪伦创作的369首歌词,由诗人西川,学者奚密,乐评人马世芳、李皖、罗池等担纲翻译,几乎囊括了迪伦半个世纪以来的主要专辑作品,此工程相对浩大,堪称迪伦诗歌翻译之大成,为更全面了解迪伦的诗歌艺术提供了便捷的中英文对照本。

主流杂志如《中国新闻周刊》《环球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纷纷推出迪伦相关的专题报道。除了分析迪伦作品中的诗歌意象、肯定他获文学奖的实至名归之外,部分作者也关注到迪伦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如在《鲍勃·迪伦:我不在那儿》一文中,作者引用乐评家李皖将迪伦视为与爱因斯坦同等重要地位的事例,指出1980年代初,就已有许多在时代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从各种各样隐秘的渠道,聆听到了鲍勃·迪伦沙哑的声音”,“鲍勃·迪伦的名字、歌声与精神,几乎以一种毫不走样的译笔,翻译传达到了中国”(温天一,2016:58)。谈到迪伦转向摇滚乐时,袁越认为“正因为有迪伦在前面开道,流行歌曲从此便不再只是以爱情为中心的口水歌了,它还可以是严肃的诗歌,流行歌手也不再必须是长相好看的偶像了,像迪伦这样的用真嗓子唱歌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歌星。于是我们这才有了U2乐队,有了斯汀(Sting),有了斯普林斯汀,有了罗大佑,有了崔健,有了许巍”等(袁越,2016:47)。他们对于迪伦独特的艺术文化影响力,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体认,认同了这种跨越种族、语言与国界的文化传承。

除了传统的纸媒传播之外,现代网络媒体对于迪伦在中国译介传播的推动亦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多家网络媒体及时跟进,竞相报道迪伦获奖及其他,多位乐评人如马世芳、郝巍、李皖等利用访谈或博客等形式阐述对这一文化大事件的解读。音乐人特别是摇滚乐界的创作型歌手汪峰、陈升等表达了对迪伦由衷的推崇,他们的歌曲作品亦多有借鉴。由于中国摇滚歌手们对于西方摇滚乐的演绎以及在各媒体平台上的宣传,更是提高了摇滚乐以及迪伦在中国的

认知度。著名摇滚歌手汪峰就曾出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致敬迪伦,专辑名称脱胎于迪伦最著名的歌曲《答案在空中飘扬》(*Blowin' in the Wind*)。郝舫等人在采访中对迪伦的创作与获奖极为认可,认为迪伦的获奖是“非常规美学或者说新美学的胜利”(2016)。民谣歌手杨一采用迪伦的演绎风格,以口琴和吉他来表演迪伦及崔健等人的歌曲,强化了迪伦的中国化之路。诗人余光中曾模仿迪伦的《答案》创作了《江湖上》一诗,后经人谱曲发行。网络媒体对迪伦的介绍,本质上推动了迪伦在中国的译介与(再)经典化,提高了他在业内的知名度,促进了大众对流行音乐文学与文化的认识。有关迪伦的纪录片及电影也陆续在各大网络平台播出,优酷、酷我、网易云、音悦台、QQ音乐等知名音乐平台,几乎上传了迪伦的每个专辑,大部分都有中英文字幕(尽管文字质量大可商榷),使得迪伦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从文字到音乐再到影视都获得最广泛最直观的立体传播与欣赏方式。

作为一种世界音乐文化现象,迪伦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他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不乏理论与现实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的相关研究仍然多限于较平面化的理解与脱离音乐的歌词译介,很难多维度地再现诗歌中的音乐性、歌唱性与文化性,且其作品翻译的质量和数量仍明显不足。我们应该认识到,必须重视以歌曲译(配)歌曲,使之可歌可唱方为正途,正如迪伦本人所强调,“歌曲是应该用于歌唱而非放在纸上供阅读的”(Dylan, 2020)。迪伦的歌词都是配乐的,脱离乐曲的歌词,无异于折断了一只翅膀的飞鸟,如何能自如而诗意地翩跹于自由的天际?

5 结语

与当代音乐文学既相同又相异的是,迪伦的音乐文学在鉴赏和传播方式立体而多样,既可读又可歌,更可借助现代多媒体技术达到一种视听的全方位审美效果。随着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大分野”的退场,“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种种边界日渐消泯”(Huysse, 1986:ix),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开始摒弃高低雅俗的等级偏见,探索大众文化的艺术化与高雅文化的大众化。于此,迪伦音乐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已毋庸置疑,成为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面向,其翻译带来的挑战与思考值得关注。这种符际翻译因为“涉及不同的语言能指与非语言能指,涵盖更多的空间情境和层次”(孙艺风, 2020:17),且跨越多个学科,难度很大,或许这也是国内学界此前较少探讨的原因。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领域日益吸引国外学界的密切关注,他们在认识论或本体论上阐述了歌曲翻译的本质,探讨了歌曲翻译中跨越语言的诗性、音乐性与表演性这种三合一的艺术审美再现再造之必要性与可能性(陈历明等, 202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迪伦致力于将音乐和诗歌艺术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获奖无疑向世人召唤诗的音乐性以及音乐的诗性之本体回归。历久弥新的《诗经》都是用于歌唱的,正所谓“诗经即乐经”(朱谦之, 1935:43)。评委恩达尔曾就迪伦获奖引发的可能争议时提醒,“在古远的往昔,所有的诗都是适于歌唱或有韵地吟诵的”;迪伦“并不歌唱永恒,只歌唱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好似德尔菲神谕正在播报晚间新闻”(Engdahl, 2016)。的确,迪伦以其诗歌与音乐的立体传播方式,不仅激发了受众日常的艺术审美,而且不失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关注。他的歌曲既有偏政治的,有偏审美的,亦有两者兼顾的,但无论哪种主题,总能做到政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政治化的平衡。而在中国的文学传统,就如陈世骧所指出的那样,“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Chen, 1972:20),这一传统就如绵延数千年的一条长河,无论如何曲折却几乎从未断流。迪伦的这种音乐文学在异域中国的译介

旅行,也部分契合了这一传统。自古以来那一脉强劲的抒情传统,也会不同程度地支撑着艺术审美的延展。迪伦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译介嬗变,自 80 年代末以来,开始趋向多元,并借助其获奖效应达到相对繁盛期。迪伦的获奖向世人呼唤诗乐本归一体的文学传统的回归,他敏于利用各个时代的传播媒介,借重现代的舞台表演形式,还诗歌语言以崇高的艺术风格。其音乐文学在中国的旅行,从无到有,由简及繁,日益彰显出本土文化的自信与接受外来文化的自觉,堪称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文艺政策与艺术审美双重变奏的一个缩影,一段文明互鉴互通的历史。这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并构建中国音乐文学及其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亦不失为良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 Chen, Shih-Hsiang. 1971. 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J]. *Tamkang Review* (2/3): 17-24.
- Collingwood, Robin G. 1946. *The Idea of Hist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gdahl, Horace. 2016. The Nobel Prize Award ceremony speech[EB/OL].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16/ceremony-speech/]
- Dylan, Bob. 2020. Nobel Lecture[EB/OL].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16/dylan/lecture/]
- Huyssen, Andreas. 1986.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M].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 Jakobson, Roman. 1971.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G]//*Selected Writings II: Words and Languag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260-266.
- Manchester, William. 1974. *The Glory and the Dream*[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Said, Edward.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白婴. 1988. 美国民歌手·波勃·狄伦的摇曲[G]. 国际诗坛(第一辑). 桂林:漓江出版社.
- 曹华飞. 2016. 鲍勃·迪伦获诺奖是文学的自我开拓[N]. 光明日报, 10-15 第 12 版.
- 曹新宇, 张伟. 浪漫英语经典名曲[M].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 沉睡. 2010. 摇滚时代[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陈历明, 马双. 2021. 歌曲翻译理论:一种交叉学科研究[J]. 人民音乐(6):82-87.
- 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迪科蒂斯. 2017. 作为词作家的鲍勃·迪伦[J]. 叶丽贤, 译. 世界文学(2): 43-64.
- 迪克斯坦. 1985. 伊甸园之门[M]. 方晓光, 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丁杨. 2016. 从现在起,伴着鲍勃·迪伦的歌声阅读他[N]. 光明日报, 10-15 第 12 版.
- 杜梦甦. 2012. 流行音乐之旅[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 恩达尔. 2017. 颁奖词[J]. 傅燕晖, 译. 世界文学(2):7-9.
- 傅浩, 戴淮娜. 2017. 鲍勃·迪伦歌词选[J]. 世界文学(2):12-42.
- 郝舫. 2016. 鲍勃·迪伦获诺奖是新美学的胜利[EB/OL].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6/1014/c403992-28777698.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黄燎原, 韩一夫. 1992. 世界摇滚乐大观[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李凌, 薛范. 2005. 民间歌曲·现代创作歌曲[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李皖. 2014. 娱死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陆凌涛, 李洋. 2003. 呐喊, 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马汉广. 2017. 鲍勃·迪伦事件与文学边界. 探索与争鸣(12):158-166.
- 马歇尔. 2017. 鲍勃·迪伦与学苑[J]. 周颖, 译. 世界文学(2):64-77.

- 曼彻斯特. 1978. 光荣与梦想[M]. 朱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毛泽东. 199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欧阳江河. 2011. 重读鲍勃·迪伦的抗议民谣[J]. 三联生活周刊(14): 68-71.
-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组. 1986. 世界歌星大会串[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9. 音乐欣赏手册(续集)[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 孙艺风. 2020. 探索翻译空间[J]. 中国翻译(1): 5-18.
- 谭冰若. 1986. 抗议·思索与创造——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J]. 音乐爱好者(8): 140-41, 45.
- 滕继萌. 1996. 鲍勃·迪伦: 一位摇滚艺术家诗人的生平[J]. 外国文学(2): 34-35.
- 滕继萌. 1996. 论鲍勃·迪伦的创作[J]. 外国文学(2): 36-51.
- 王小峰, 章雷. 2008. 欧美流行音乐指南[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小峰. 2011. 鲍勃·迪伦一直是个谜[J]. 三联生活周刊(14): 40-48.
- 温特. 1988. 现代世界文化词典[M]. 祁阿红,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温天一. 2016. 鲍勃·迪伦: 我不在那儿[J]. 中国新闻周刊(39): 56-69.
- 薛范. 2001. 翻译歌曲的历程[J]. 音乐研究(3): 13-20.
- 杨晶. 2018. “文学文化”与“新人”的塑造[J]. 文艺理论研究(4): 207-213.
- 袁越. 2011. 鲍勃·迪伦的时代[J]. 三联生活周刊(4): 60-67.
- 袁越. 2016. 摇滚诗人是怎样炼成的[J]. 三联生活周刊(43): 39-57.
- 张铁志. 2010. 时代的噪音: 从迪伦到 U2 的抵抗之声[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章珍芳. 1982. 美国歌曲选[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 钟子林. 1998. 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 周公度. 2016. 鲍勃·迪伦诗歌选[J]. 诗歌月刊(11): 89-90.
- 周立文. 2011. 鲍勃·迪伦来了[N]. 光明日报, 04-12 第2版.
- 朱谦之. 1935. 中国音乐文学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庄曜. 2000. 探索与狂热: 现代西方音乐艺术[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Bob Dylan in China

MA Shuang CHEN Liming

Abstract: Although Bob Dylan has been well-known in Europe and the US since the 1960s, there were only been intermittent translations of him into Chinese in the early 1980s. Only after Dylan was re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s a poet and singer in 2016 did Dyla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 in China come to be more diversified and prosperou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Dyla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 chronological elaboration of Dylan'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in China offe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ies of a particular era influenced the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a. Such an approach is expected to shed light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auses of Dylan'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s evolution in China.

Key words: Bob Dylan; song;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literary policy; aesthetics

责任编辑: 龙丹